

〈論説〉

“儒教”空間的當代實踐

——以孔子學堂為案例

葛 詩 嫣

摘要：中國的儒教的歷史では、官學と書院が共存し、相互補完しており、祭教が一致し、協力して儒教空間を構築し、教化の「教」を實踐した。現代において伝統文化の復興という背景の下で、官學が欠けているため、儒教の教育が沈下し、民間で様々な儒教の實踐が生まれた。現代の儒教の實踐の事例として、ある孔子學堂の教學活動を考察した。その結果、その核心理論が仏教を中心としている、儒教思想の認識にずれがあること、下層に集中していることという三つの特徴を明らかにした。現代の儒教復興は儒教の「祭教一致」の特徴を無視してはいけない。學問に対する信仰を再び拾って、儒教の教育實踐と結び付けて、儒教空間の實踐の中で時代に適應する儒教精神を構築すべき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儒教空間；儒教實踐；廟學合一；儒教

“儒教”話題一直充滿爭議。不可否認的是，儒教既有學問的一面，又有宗教的表現。禮樂刑政既是儒教的制度建構，又在天人關係、祭祀祖先、聖賢信仰等方面體現出宗教的性格。儒教是一個實踐的宗教，建立中央官學和地方廟學並且在其中設立聖堂，通過祭祀聖賢強化儒家信仰，為儒學教育賦予了神聖性。廟學合一、祭教一致，是在儒教空間踐行儒教之“教”的形

态。

在历史上存在过的儒教是一个依附于政治的文化体系。儒学作为国家的正统思想，通过官方支持开展各级官学的文化教育与道德教化，统一服务于官方的政治需求。建立官学的历史可追溯自三代。《礼记·明堂位》记载了“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学也。頖宫，周学也”¹。这种官学的制度在儒学正统化后日益发达，并在唐宋以来扩展到地方庙学，成为通过教育政策的实施来修治明德、教化国民的儒学实施传统。然而，封建帝制崩溃后，儒教的制度也随之解体，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保障，“官学”性质的儒家思想也失去了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正当性。另一方面，我国早在春秋时期便出现了以孔子为代表的私学传统，自唐代又兴起以书院为中心的教育系统，并自两宋以来扩大规模，逐步制度化，形成了与官学共存的民间教育模式。在官学作为儒学正统传承的载体之外，书院应运而生，成为官学的补充，并逐步形成完备的书院制度，使儒学教育下沉，拓展到官方教育之外的层面。

如今，中国面对着复兴优秀传统文化、批判利用儒家思想优秀成分的历史任务。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不断提高，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与日俱增，从而产生了“国学热”等寻根传统的社会现象。在新的环境下，一方面儒教的官学制度缺位，难以直接移接传统的自上而下模式；另一方面以儒教或传统文化为旗号的私学自生，民间模式能否承担儒学的时代责任，同样引人深思。

一 问题的提出：当代儒教空间的实践

儒教是一个既存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儒教作为“儒释道”三教之一，相对于佛教和道教而言，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体系，并且总体上占据绝对主流地位。儒家的早期思想在孔子之前就已经产生，孔子作为“祖述”、

1 《礼记·明堂位》。见【清】孙希旦撰：《礼记集解》第三十一卷，中华书局，2019年2月，第853页。

“宪章”者编纂六经，并奠定了儒家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将儒家思想官学化、正统化，并结合汉代谶纬学说将儒学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产生了一定的宗教意味。同时，此时的儒学也经过“太学”“五经博士”等制度的设立走向体制化，成为国家政治与教育制度的结合点。隋唐时期三教并立，出现了三教合流的趋势，儒教在与宗教的碰撞之中自我反思和再次认同。北宋产生了理学，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形而上学般的重构，并且经由政权的支持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普及到社会，加深了神学的意味。随着中央政权地位的不断提高，对儒学的需求也日益强烈，儒教最终成为了官方教化民众、统治社会的思想体系。

儒学是实践的哲学，儒教是实践的宗教。儒家主张知行合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²体现了儒家实践的智慧与自律；“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³的思维模式也为人们树立信心，在现世中积极解决问题。伊藤仁斋认为，儒家之道是“人伦日用常行之路。非待教而后有。亦非矫揉而能然。皆自然而然”⁴，并且此道深入个人生命实践，“不可须臾离也。”⁵儒教通过一套丰富的理论建立人间制度，以“教化”的模式运作，使更强大的自己来面对人生的障碍。这种教化不是一味的灌输，也是一种自我培养，体现了人的自主性。儒教是实践者，是“行动派”，每个人都亲自参与“教”的动态过程，完成对于此世幸福的构建和对于来世延续的信心。这种实践的内涵也决定了儒教的入世性底色。正如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和《中国的宗教》中的主要观点，儒教具有适应此世社会的伦理，渗透在货币制度、行政制度、土地制度、社会结构等经济、法制、社会等各种领域。由于皇权可以等同于克里斯马观念，并且将宇宙秩序和社会秩序等同，儒教影响下的中国人将人生理想投射到通过人文教养而带来的社会地位的提升，并

2 《中庸·第二十章》。见【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01年11月，第31页。

3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见【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八，中华书局，2001年11月，第165页。

4 【日】伊藤仁斋：《语孟子义》，日本儒林丛书，第六卷，凤出版，1971年，第14页。

5 同上。

通过政治法则和礼仪规范的约束完成人生实践,从而无条件地顺应现世⁶。相对于伦理价值产生了资本主义新教,韦伯认为儒教同样具有较强的理性观念,但将人生实践落脚于某种文化、社会地位,通过教育、礼仪、伦理的规制来适应既有的生活。可见,儒教是在实践中探索自我、发展规模,从而完成“教化”的过程。

儒学是关注现实、不断实践的学问,因此也面临着与时代相适应的历史任务。“儒教”的复兴不仅是一个学术界的话题,更是一个值得每个中华民族去思考的自我认知课题。结合“儒教”的历史渊源,要复兴儒教并非简单的“儒”的复兴,更关切着“教”的复兴、教育的复兴、宗教的复兴、教化的利用等等一系列问题。儒教的发展借助了封建统治的认可。儒学自东汉起成为官学,并被制度化为一个与政治密不可分的综合体系。从历史的脉络来看,从东汉直到清末,儒教的地位在整体上不断提升。但随着封建帝制的崩溃,科举制度终止,长期依附于官方力量的儒教体制瓦解,儒教失去了自上而下的支持,沦落为落满灰尘的文物遗迹,散落于文学、哲学、考据、思想史等的各个角落。

然而,儒教并没有从此而彻底消失。一方面,作为“儒教”的核心人物与精神象征,孔子的地位也经历着起起落落,时而被看作落后的倒行逆施,时而被认定为传统文化和教育的大家,时而作为陈腐的封建符号被打压,时而被作为文化形象用于推广汉语与中国文化。另一方面,随着当代中国对传统文化重视的加强,社会上儒学复兴的呼声日益高涨,出现了“国学班”、书院、读经班、孔学堂等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己任、致力于继承和弘扬儒家思想文化的当代教育实践群体,课程新奇,生源不断,一度成为社会热点。从家长们趋之若鹜地为孩子们报国学课外班、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到各类“学堂”学习儒家经典、手机音视频软件带动了以“国学”为主要内容的有声读物畅销等现象可以看出,儒教复兴在民间是有需求的。这些儒教实践行为在重构儒家制度、拓展教育范围上的“成功”,反映了儒学在既适应时代需求

6 [德] 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 宗教与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0页。

又符合当下价值观念的维度中勃发的一个侧面。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对于仪式的需求重新被提起，开笔礼、祭祖仪式、祭孔典礼等传统礼仪文化以“复古”的方式重现于当代，但礼仪的标准缺乏专业考究，即使在国家级、省级的大型典礼中，服饰、祭品、仪轨等细节也往往经不起守经据古式的推敲。从本质上讲，这些发自民间的儒教实践处于儒家文化复兴的摸索阶段，往往只得其形，而未尽其“神”，缺乏对于儒教内在宗教性的体认，未能解构儒教在信仰层面的神圣性。

儒学是实践的学问，对儒教的研究自然不应局限于书本理论。如何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重拾儒教之“教”的精髓，践行符合时代需求的儒教，既需要从传统中挖掘内涵，又不能忽略活生生的实证案例。“孔子学堂”是一个中国孔子基金会创办的公益文化品牌，通过各地组织自由申请、自行管理、自觉接受督查的方式，在全国设立了超过1500个传统文化教育基地，统一挂“孔子学堂”牌，进行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传播与教育。⁷本文将分析传统的儒教实践空间，并结合对当代一所“孔子学堂”的案例研究，希望从理论与实证的双重角度解读儒教的实践精神，探索当代儒教实践在内涵与形式上的可能性。

二 儒家教育空间的渊源与传统

儒家思想的历史悠久，而在固定的场所实施儒家教育、实践“儒教”的历史也基本伴随着儒家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早至夏商周三代，便出现了在官办教育空间“学宫”内教学、祭祀、宣政的记载。这种官学形态的历史一直延续到清代封建帝制的解体，儒学失去官方对其正统地位的庇护。另一方面，春秋时期“私学”兴起，出现了在官方建立的儒教空间之外教授儒家思想并致力于学术交流和文化活动的现象。“私学”源自民间，后在唐宋时期流变，并且逐渐制度化，形成了儒教空间的新形式——书院。书院是民间创

7 见孔子学堂官网：<http://kzxt.chinakongzi.org/guanyuxuetang/xuetangjieshao/>。访问时间2021年5月10日。

立的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教育文化组织，与官学相互补充，形成地方团体力量推动的“儒教”实践形式。因此，对儒教空间的概述将从官学、书院两个方面进行，并应注意到私学与官学之间的张力和孔子形象对于儒教空间发展的影响。

1 官学与庙学合一

学校是实施教育的空间，最早由官方建立，可追溯至虞舜时代。《礼记·明堂位》中“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学也；頖宫，周学也”⁸可见有政必有学。在夏商周时期，教育空间主要是“学在官府”的形式，官师合一，学校既是教育场所又是祭祀场所，“庙学合一”，统一于施政的目的。“制作礼乐以教后世者，先圣也，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也。承先圣之所作以教于大学者，先师也，若伯夷、后夔是也。”⁹礼记没有明确先圣与先师的指代，但早期先圣与先师统一，对为政者与教育者的地位是同等重视的。¹⁰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传承了早期儒家思想，成为儒家学派的代表性人物。

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¹¹，劝谏为政者开办太学，以儒学作为教育内容来培养人才，辅佐于统治集团，最终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化民成性”。对于国民的德行教育，董仲舒以“性三品”说来论述儒教之教化的必要性：“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

8 《礼记·明堂位》。见【清】孙希旦撰：《礼记集解》第三十一卷，中华书局，2019年2月，第853页。

9 《礼记·文王世子》。见【清】孙希旦撰：《礼记集解》第二十卷，中华书局，2019年2月，第560页。

10 有关夏、商、周三代官学祭祀所体现的“庙学合一”特点，可参见葛诗嫣：《从“庙学合一”制看儒教的制度化》，《爱知论丛》110号，第77-81页。

11 【东汉】班固著，谢秉洪注评：《汉书·董仲舒传》，凤凰出版社，2011年1月，第215页。

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缲以涓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之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至也，故不谓性。”¹²董仲舒将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筭之性三种，认为只有中民之性可以通过教化而改善，强调了王道政治对于国民德育的后天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¹³在汉代的儒教建构中，学问、德育的实施都由君主及中央政治集团主导，而人才培养和民风优化又保障了政治的实施。从儒学发展史来看，汉代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基本理念的正统地位，在教育空间方面体现为官方主导儒家教育，开办“太学”培养服务于国家政治的儒家人才。这样的儒教制度基本奠定了其后儒教空间以官办为主的发展模式。

唐武德二年（619年），高祖下诏：“惟兹二圣，道著群生，守祀不修，明褒尚阙。朕君临区宇，兴化崇儒，永言先达，情深绍嗣。宜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¹⁴，兴建国子学，并以孔子、周公作为学校内祭祀对象。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¹⁵，将庙学合一制度推行至全国各级官学机构，并伴随科举制度的完善将政教一致推向新的高度，也随着儒家教育的普及深入民间。两宋以来，地方多依托既存孔庙建学，传承了官学的教育传统，形成了“学必有庙”的庙学合一制度。随着地方庙学数量的增加，儒教推行到了更多的州、县、乡级单位，明清时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¹⁶，通过教育空间的功能带动了儒学的辐射力与影响力。

“祭者，教之本也已。”¹⁷祭祀是儒教空间的重要构成部分，通过在学校内设立“圣堂”，举行释奠礼来践行对于儒家圣贤的信仰。释奠在周代是祭

12 《春秋繁露·实性第三十六》。见【清】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卷第十，中华书局，2015年10月，第303页。

13 同上，第304页。

14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4940页。

15 【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373页。

16 赵伯陶校注：《七史选举志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17 《礼记·祭统》。见【清】孙希旦撰：《礼记集解》第二十五卷，中华书局，2019年2月，第1243页。

祀先圣、先师的仪式，祭祀对象并未留下明确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释奠重回历史舞台，但祭祀的对象并不固定，多为孔子或周公。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举行释奠礼。到了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正式确立以孔子为先圣举行释奠礼，后令各州县建孔庙祭祀孔子，推行地方的“庙学合一”¹⁸。唐玄宗时期，颁布《大唐开元礼》确定了释奠的具体内容，“释奠礼”自此成为祭孔的代名词。“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¹⁹祭祀是儒礼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官方学校祭祀先师，赋予圣贤儒者以神圣性，也承载着为政者对于礼仪教化的肯定。

庙学合一是儒教空间的重要特点。“夫祭之为物大矣，其兴物备矣。顺以备者也，其教之本与？”²⁰祭祀是教育的根本，也是儒教的立教之本。官学与孔庙（文庙）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儒教教化民众、化育民风的政治功用。

2 书院组织的发展

从中国的教育历史来看，相对于服务于政治需要的官方学校，还有民间自行筹办的私学——书院。书院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唐代，顾名思义，是以藏书为中心的文化教育组织²¹。书院在宋代定型，形成稳定的制度并迅速发展，数量显著增加至720所²²，成为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由于一些书院优秀的办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也有代替官学实施地

18 见【唐】魏征：《旧唐书》。“六月戊戌，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马松源主编：《中国古典名著百部·史书经典卷》，线装书局出版社，2012年，第161页。

19 《礼记·祭统》。见【清】孙希旦撰：《礼记集解》第二十五卷，中华书局，2019年2月，第1236页。

20 同上，第1243页。

21 见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书院是新生于唐代的中国人土人的文化教育组织，它源自民间和官府，是书籍大量流通于社会之后，数量不断增长的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读书、教书等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传播的必然结果。”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第2页。

22 见邓洪波：《中国书院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第65页。

方儒学教育、合作培养人才的趋势。²³书院受到了一定的官方扶持，由官方和民间两股力量共同推进书院的扩张，使其数量增加并进入较快发展阶段，同时奠定了成熟的书院制度。到了元代，书院组织受到政府重视和肯定，部分书院获得备案，成为合法化的教育机构，“官学化”趋势成为显著特征。明代，作为独立教育组织的书院自行发展，到后期进入繁荣阶段，弥补了官学教学的僵化风气，进一步“平民化”。与此同时，后期结社化、政治化的书院也一度遭到官府的禁令抑制。到了清代，书院发展进入鼎盛时代，数量高达5000余所²⁴，进入普及化阶段，而“西学东渐”的历史局面也为书院的存在模式增加了教会书院、西学书院、实学书院等更多的可能性。面对列强入侵、清政府垮台的民族存亡危机，书院也不得不改制，以经世致用、中西并举、鼎新革故等措施适应现代化的趋势。如今，书院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提倡，再次回到人们视野，以新的面貌践行这一历史悠久的组织形态。

书院的发展由社会各界力量支持、推动，并经历制度化过程，形成一定的组织规模，成为地方的藏书、文化、教育空间。“所谓书院是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主要表现在它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了传统的官学和私学，并在这两者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质而言之，它一方面吸取了历代官学系统具有积极意义的办学传统；另一方面它又是直接对传统私学的继承和发展。在对传统的官学与私学综合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不是官学但有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又与私学具有内在联系的独特的教育组织，或者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制度。”²⁵因此，民间自办、自养一直是书院的本质特征。在官学教条化、科举功利化的时代，书院的存在为民间怀有儒学、理学的学术理想的儒者提供了更加纯粹的教育环境，推动了民间学术的求真务实。在应试教育、学术教育之外，书院提供了素质教育的可能性，为难以触及官学教育

23 见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岳麓、湘西二书院位高州学，特别是岳麓书院成为“三学”中的最高学府，说明书院的教学水平、教育质量以及高居州学之上，反映出书院在替代官学的过程中，已经形成自己的长处，并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官学所无法替代的优势。”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13页。

24 见邓洪波：《中国书院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第449页。

25 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29页。

的各地百姓提供了读书场所，适应了更广泛的民间教育需求，践行着民间教育的理想。

此外，作为地方的文化教育组织，书院还具有培养当地人才的民间自教功能。一方面，书院的成立离不开有教育理想的创办者，这些书院的开创者或办学领袖往往是大儒，作为书院的历史渊源受到后人的尊敬与祭祀。另一方面，安处地方风景名胜的书院是有鲜明当地特色的教育、文化空间，通过对本地的乡儒、乡贤的纪念，带动地方学派的发展与民风教化。特别在南宋时期，理学各流派的发展离不开各大书院作为儒教空间的讲学、传播、交流等作用对各学派学脉的延续。书院的教育目的不单是为了科举，相对于为政治服务的官学而言，书院文化的个性鲜明、功能多元，是更加广阔的学术原野与更多育种的文教沃田。

然而，书院的自行发展也存在很多教育实践过程中的问题。由于书院的创办具有较强自主性，其教育资源未经官方遴选，缺乏从业标准，仅凭管理机构敲定，专业性难以判定；仅凭民间自发认定的教师、教材、教育方式等，难免存在偏颇，如何保障教育质量、衡量教育成果也是办学需解决的根本问题。

3 私学与官学的流变及其对庙学制度的继承

书院产生于官学式微、私学兴盛的历史背景。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创办私学，“有教无类”，就产生了文化下移的现象。因此，儒学并非一直高高在上的官学，也具有渗透民间的私学渊源。

到了书院勃兴的唐宋时期，私学的势力回到了百家争鸣的办学局面。“随着宋代书院教育的发展，出现了上层文化向下层平民文化的转移。所谓平民文化，是指相对依附于上层贵族等级文化而言的，即是指社会下层广泛参与的社会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这种平民文化几乎在一切文化领域都有所体现和反映。”²⁶书院是私学的制度化、规模化，二者具有同样的民间基础。

26 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72页。

促进教育特别是儒学教育在民间的传播，是教育下沉的重要方式。在任何时代，书院与官学之间都存在张力，也都具备一定的合作条件。私学的存在为儒教实践提供了非官办的可能性。由藏书、印书、讲经场所发展而来的书院，以儒家经典和胜任儒学教育的儒者为中心展开儒教实践，抽离了儒教的教育成分，民间的儒学传播和研习不再只为为政者的施政方针服务。

不过，书院也存在“释奠礼”。在书院中祭祀先师孔子，同样具有赋予教育教学活动神圣性、确立儒家信仰的作用。在祭祀制度上，书院与官学有很多不同之处，如书院的祭祀对象中“先贤”突出，包括官员、文化名人乃至神灵，²⁷具有“泛儒化”的趋向，这也是依托儒学所建立的文教机构的普遍特点。此外，地方书院祭祀的教化功能还体现为传承特定学派、学者的学术思想，为私学“护教”，具有鲜明的儒家道统意识。

“道统”之说源自韩愈。韩愈在《原道》中提出了“道统说”，将“仁义”规定为道之“定名”，并规定了儒家道统的谱系：“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²⁸儒家之道不同于佛老之道，可追溯至尧舜，经历过孔孟传承之后的“道”没有继续传下去。这种观点也反应于张载“为往圣继绝学”的观点。

孟子认为：“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大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²⁹基本认可了孔子对于尧舜之道的传承。

27 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40-351页。

28 见韩愈《原道》。【清】姚鼐编：《古文辞类纂 上》，崇文书局，2017年5月，第9页。

29 《孟子·尽心下》。见【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十四，中华书局，2001年11月，第376-377页。

朱熹将道统的内涵概括为：“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庶几也。”³⁰道统源自尧、舜、禹的“圣圣相承”，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夫子之后，“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曾氏再传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在孟子之后的千余年中，佛道二教兴起，对儒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后有二程传子思，“能因其语而得其心”，继承了先儒之“道”。可见，道统意识是宋明理学兴起的产物，目的是树立儒家学术正统意识，拨乱异端，对抗佛老等其他思想体系，怀有儒学复兴的学术使命感和责任感。

书院传承了儒学教育的释奠礼，具有确立对儒教伦常道德观念的认同感、引发士人对儒学的信仰、激发士人的道德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教化社会等社会功能³¹。将书院的重要开创者、讲学者作为“先师”，通过祭祀行为树立学术权威，以传圣人之道，成为书院办学的精神象征，也确立了该学派的学术发展方向。因此，书院祭祀活动的自主性也为先人道统之外的儒者提供了入祀圣堂的机会，激励着不同学者们表达自身儒学见解，通过学术观点的创新和传承推动儒学的多角度展开，为自身学术体系纳入学术脉络并正当化而投身儒教的学术实践。南宋理学兴起，先后涌现多派学说，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大儒也成为当地书院或其他认可其地位的书院的祭祀对象，并延续“尧舜禹汤文武孔曾思孟程”的谱系。在书院祭祀学派祖师，不仅肯定了这些大儒、大师的学术思想，推崇其学术成就，也是彰显书院的渊源和地位的体现。当然，这种释奠礼祭祀对象的自主性也引发儒者们为了跻身学脉而产生派系斗争、排除异己的现象，是私学自相竞争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30 《中庸章句序》。见【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01年11月，第14页。

31 肖永明：《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52-368页。

过程。总体而言，书院的释奠礼相对于官学“庙学合一”的祭祀行为而言，所产生的社会功能也更加贴近民间教育的需求，反映了儒教实践的生态多样性。

4 “圣之时者”：孔子的形象

孔子是儒学的代表，也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孔子作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承前启后者，对于儒教之“教”的奠基和弘道的意义毋庸置疑。释奠礼在唐代完全发展为祭祀孔子的仪式，同时孔子也成为了儒教空间的人物形象。孔子的地位经历着“成圣”的过程，通过历代帝王的封号、赐爵甚至封王行为，可以看出孔子由私学创办人逐渐官化、王化，以致于圣化，进入儒教官学并成为后代儒者的精神信仰，通过祭祀制度发挥着社会教化功能。这样将弘道者神圣化并作为祭祀的对象，本身就是儒教依人不依神、自我教化、自我救助的特点。

在当代，孔子的形象被应用到文化教育的各个方面。在外交上，以孔子形象命名的“孔子学院”发挥着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的功能。在民间儒教实践中，孔子是儒家精神文化的象征，用来命名各种“孔子学堂”、国学班、读经班等教育组织。孔庙、高校等文教场所内的孔子塑像也受到了莘莘学子们的“祭祀”。每当高考、考研甚至期末考试等大型考试期间，孔子像前都摆满了考生们“献祭”的各种零食，承载着考生对于当代“科举”进学的理想。甚至在教师资格证考试期间，孔子像前都会比平时多几束鲜花和食物，孔子被临时充作教育行业的“祖师爷”与“行业神”。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形象在当今有滥用的风险。将“孔子”作为“文化品牌”的具体使用过程中，应充分了解孔子作为儒教实践者的本质精神，而不是一概而论，打着孔子的旗号大行“传统文化”，沦为泛文化的虚位。

三 当代孔子学堂的案例研究

在儒教解体、官学缺位的当下，民间对儒学和传统文化的需求依然强烈。孔子学堂是民间儒教实践的一种下行路径，以孔子基金会的文化品牌为

依托，在全国各地开展各种读经、讲学、祭孔等传统文化活动。作为当代儒教实践的代表之一，孔子学堂能否作为儒教空间传统的延续，应当从儒教发展、庙学制度、书院制度的角度思考其对儒教本质的解读方式。为了解当代儒教实践情况，选取湖南省某市的孔子学堂作为调研对象，通过前期资料搜集、讲座视频的观看、印刷资料的阅读、创始人介绍与访谈、学员交流与访谈以及为期三天的田野调查来呈现该孔子学堂的实践状况。

1 背景：三教合一的地方传统

该孔子学堂位于湖南省，地方书院文化发达。两宋以来，湖广一代书院林立，是平民教育盛行的反映。湖南的岳麓书院是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描述了湖南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书院盛况。北宋开宝九年，潭州知州朱洞创建岳麓书院，获得了朝廷支持，受赐书、额匾、田，与衡阳石鼓（登封嵩阳）、庐山白鹿洞、应天府睢阳书院并称四大书院。南宋时期张栻、朱熹在此讲学，并形成湖湘学派，岳麓书院成为重要的儒学基地，也是南方的教育文化中心之一。³²这种地方文化传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文教实践，激励着有志之士以教育为己任，创新教学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岳麓书院所在的岳麓山也是一个三教合一的名胜古迹，在传授儒学的岳麓书院之上，还有佛教寺庙麓山寺，道教场所云麓宫。攀登岳麓山，初见儒，又见佛，再见道，本身就是一个三教融合的体验。可见，在地方文化盛行之处，门派之别甚至教门之别则不甚明显。

此外，四大书院的石鼓书院也位于该孔子学堂的所在地。石鼓书院历史悠久，可溯至唐代。宋代曾作州学，且曾有大儒周敦颐、朱熹讲学。据《重修胡文定公书院记》所载：“天下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以隶岳故也。岳志载衡书院十有八，惟文定书院独敕建为最著，以传《春秋》故

32 见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书院教育培养了大批的不以仕进为目的而以文化、教育为专业的知识分子，以著名的岳麓书院为例，即可看到书院教育对宋代形成庞大的平民学者阶层起到了官学绝不可能代替的重要的历史作用。根据史书记载，岳麓书院的学生大多数走的不是利禄之路，而是以教育为其职志。他们秉承师训，创办书院，热心教育，在教育上颇有建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75页。

也。”³³虽然石鼓书院作为四大书院是有争议的，但《南岳志》有“景祐间，集贤校理刘沆以书院上请，始赐额并学田，遂与睢阳、岳麓、白鹿并称为四大书院”³⁴的记载。由于石鼓书院后来损毁，未能流传文脉，故在后世评定“四大书院”时偶被其他书院所代。但不可否认的是，石鼓书院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名震一时，是当地的重要文化遗迹。“公元1167年，闽学与湖湘学两大理学流派的代表——朱熹与张栻，嘉会于岳麓、石鼓，开创了中国传统教育中自由讲学、自由辩论的先河，为理学的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生命力，对后世学术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使得提倡自由辩论、思想碰撞的书院文化日益兴盛。”³⁵

此外，该孔子学堂所在地还有胡安国、胡宏坐镇的文定书院、张栻创办的南轩书院、纪念王夫之的船山书院等。可以说该地集结了大半个理学名家，承载着宋学的历史，具有一定的民间自主筹建儒教空间的渊源。

2 孔子学堂的创办

该孔子学堂的创始人是本地人，1981年生，高中学历，是佛教净土宗信徒。2008年参加了以《弟子规》为主要教材的传统文化讲座后便“发愿”，决心从事传统文化教育工作。经历了近十年的资助不稳定、讲课不固定的摸索阶段，创始人积累了一定的资助者、支持者、学员等人脉作为组织基础，并通过自行筹办“道德教育”“传统文化”等讲座，使讲学活动在当地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后运营作为公益教育组织的“中华文化教育中心”而稳定下来。2016年，孔子基金会同意该组织的“孔子学堂”挂牌的申请，该孔子学堂遂成为受到当地政府机关认证的正规机构。

该孔子学堂的主要活动是开班教学。开展最多的活动是以视频讲座为基础的“七天道德班”，以住宿学习的方式集体学习，每月一次，学员人数少

33 见唐浩明编：《曾国藩诗文集》，岳麓书社，2015年，第157页。

34 见明嘉靖《石鼓书院志·上部》。戴述秋编著：《石鼓书院诗词选》，湖南地图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7页。

35 谢宏治：《衡阳书院文化的发展历程及特点》，《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5页。

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课程内容多为观看与传统道德有关的儒家伦理、佛教劝善视频，学习《弟子规》《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的相关道德教育内容，辅之以宗教仪式、集体劳动、学员交流等活动。“七天道德班”的进阶模式为“三个月传统文化研修班”，每年两次，每次20人以内，通过《弟子规》《太上感应篇》《了凡四训》等视频复讲课程“扎根因果思想”，培养学员的敬畏心与善恶观，并辅助以太极拳、游学、书法等文化活动课程。在2020年春季之后，孔子学堂开展了周期更长的“三年读经班”，每个学员专攻一部经典，以期通过将一本经典研读一百遍以上从而成为“专家”。本次调研得以访谈该期“三年读经班”的全部四名学员。这些班型都是公益性，不收学费，免费提供食宿和学习材料。除定期开班讲学之外，该孔子学堂创始人也经常与政府部门和企业合作，应邀到监狱、戒毒所、企业、中学等处开展围绕传统道德教育的讲座。

孔子学堂利用了孔子象征意义，结合城乡的教育需求，将道德教育作为主要实践方式，自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力行者”，以办学、讲座、夏(冬)令营等方式复兴传统文化。

3 案例描述

从创始人的办学历程来看，该孔子学堂经历了从私学到书院的制度化过程。目前在当地有两处固定的教学空间，包括藏书场所、祭祀场所、耕作场所和寄宿学习的生活空间。其运营经费主要来自企业家资助和社会捐赠。2020年12月，该创办人以讲座的形式介绍了孔子学堂的办学实践情况，并深入交流，回答了相关提问。随后，赴湖南到孔子学堂所在地进行田野考察，参观了孔子学堂，并对学堂的义工、总务、学员、企业家资助者十余人做了深度访谈。

(1) 场所布局

该孔子学堂又称传统文化教育中心，有两处教学场所，一处市中心，一处乡村，二者相距13公里。

城区的孔子学堂占地约130平方米，共六层楼，各层之间相互独立，总

面积700余平方米。一层为教室，设有“儒释道三教”藏书室，但绝大多数书籍为佛教经典，儒家方面不多，道教则极少。二层为讲堂，设长条桌32张。三层为办公室。四层和五层分别是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设立双层通铺，可容纳几十人，条件艰苦。六层为“谦和堂”，为学务办公室，并设有专门礼佛的房间。顶层设有晾衣间，方便学员生活。学堂多用书法作品和对联装饰，主要是“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孝亲尊师”等简明通俗的儒家伦理思想。

乡村的孔子学堂占地2000余平方米，主要有两栋单层多屋自建房和一栋三层旧楼，设有教室、办公室、会客室、“万姓祖先堂”、食堂、酵素室等场所。院内有孔子像一座。位于乡村内的学堂内外都有“学田”多片，由孔子学堂耕作。虽值寒冬，学堂仍被绿意包围。经过简单的参观和讲解，我们在会客室进行访谈。

（2）教学情况

该孔子学堂设有培训部、推广部、教学部等机构，学员主要来自本地、本省，以及广东、江西等邻近省份，也有远自东北的学员。在教学上，“七天班”道德教育讲座和夏令营等活动多采用视频手段，全天播放讲解佛、儒经典的传统道德讲座，并结合祭祖仪式、祭孔仪式的实践来强化这种道德教育。在长期的“三年班”中，学习经典的方式是阅读和复讲，即读诵视频讲座中的讲座稿，并练习数百遍后脱稿。目前的研读内容主要是《太上感应篇》等以因果报应为主要思想的佛教经典，创办人介绍接下来会专注于四书。

综上所述，这种教学可以总结为一种以道德教育为目的、以佛教因果报应为内核、以视频讲座为手段、以孔子为传统文化符号、以灌输为主的教育模式。

（3）采访分析

本次调研主要访谈了该孔子学堂的创始人、总务、四位正在进行“三年班”的长期学员和一对资助孔子学堂财政的企业家夫妇。访谈内容主要是围绕该孔子学堂，介绍自己到此机构的缘由、参加相关活动的经历以及对于

“传统文化”的心理体会。

由于本期“三年班”的学员在乡村校区学习，故对这四位学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每个人都自述了自己接受孔子学堂教育的起因、收获和志愿。该孔子学堂的创办人介绍，参加“三年班”有严格的要求：个人自愿、家庭同意、学习期间不谈恋爱、手机上交、受得了责罚。在快节奏发展的当代社会，这种在乡村的孔子学堂潜心读经而“与世隔绝”的状态可以看作一次为期三年的“修行”。

以下为四位学员案例的受访自述信息提要。

案例	性别	年龄	时间	之前经历	参加缘由	学习感受	研习经典
1	男	27	2018	大学毕业工作后来此	感觉不快乐	内心快乐，希望学好并帮助其他人	《太上感应篇》
2	男	21	2018-2019	高考失利后待在家里	感到迷茫，不知道应怎样与人相处	发现以前做了很多不孝顺的事情，要改正	《太上感应篇》
3	女	34	约2018年	大学毕业后经历过谈婚论嫁，但每到结婚时又觉得人生不该这样	对传统文化有好奇心，想要安静的学习环境	意恶才是真正的恶。要消除恶念，改变自己的习气，也让更多人来学习	《俞净意公遇灶神记》
4	女	40-50	未提	患乳腺癌并多次复发	不明白为什么会得病	认为自己生病的根本原因是“女不柔顺”，对自己的丈夫不恭敬，对婚姻不满意	《太上感应篇》

通过以上四个案例可以看出，参加“三年班”的学员都有不同的内在需求，在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生问题后经由他人介绍来到孔子学堂，参加了短期班后颇有收获，并且有进一步学习的意愿，于是留下参加长期的经典研习，希望更深刻地改变自己，并帮助别人。这一期学员们研习的经典都以佛经为主，因果报应思想是该孔子学堂开展道德教育的根基。

同时，以上采访可以反映出的显著特点是学生们大多遇到了人生挫折（生活腐化堕落、高考失利、患重病）或人生问题（不明白谈婚论嫁的意义、

孩子不听话），特别是个人之前的生活有过“误入歧途”的经历，如纸醉金迷、工作学习散漫等情况。因此，该孔子学堂的学员具有一定的精神需求、价值需求、哲学需求，需要一些思想体系来引导人生观的构建，从而解决各种“迷茫”。从这个意义上看，该孔子学堂作为一个“儒教”组织，对于参加成员而言属于“救赎型”，类似于基督教产生于对于苦难中人们的救助和解脱。例如案例4中乳腺癌患者描述自己通过“复讲”《太上感应篇》而深感因果报应作用的过程中，不自觉痛哭流涕，认为自己患病多次的根本原因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并感谢孔子学堂的传统文化救了自己，治愈了癌症，也坚定了要服务于这个孔子学堂、并把这个传统文化弘扬出去的决心。孔子学堂弥补了这些遇到挫折者的道德教育缺口，使之感受到心灵的慰藉，从而对此深信不疑。从该孔子学堂的实践成果来看，其教师 and 学员都对学习体验评价较高，并且对孔子学堂具有较强的认同感，组织内的师生与义工、资助者等都有较高的“委身”程度。

可见，该孔子学堂与书院组织类似，都具有“三教合一”的特点，将儒、佛、道三家兼收并蓄，形成一个以儒为主的文教空间。但作为儒教实践组织，该孔子学堂更倾向于一种借助于以“传统文化”为名的佛教经典思想而进行价值解构、自我探索、心灵救助，进而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与传统的书院致力于经典研习、学派构建、学术创新的“精进求学”形态大不相同，而是偏重于在孔子学堂内寻求心灵慰藉与精神支持。

（4）办学特点

通过深度访谈，可以了解到该孔子学堂的运作还具有如下特点：

合法办学，紧跟时事。该孔子学堂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口号，结合当代的政治方针，配合当地政府迎合并落实教育局、文化局、国安局、民政局等对于道德教育的需求。作为该市的传统文化推广协会会长，该孔子学堂的创办人经常去监狱、戒毒所等处讲座的行为也体现了其社会担当，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扮演着“拯救者”的角色。

注重家庭，强调孝道。该孔子学堂以《弟子规》为主要文本，对学员的

行为提出要求，应当孝敬父母并恭敬祖先。同时，辅以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指出不孝者会引发诸多恶果，来劝诫孝行，以培养和睦家庭、幸福人生为落脚点。例如，以上案例2的学员认为：“《弟子规》说，做人的根本是要孝顺父母，尊敬老师。现在知道自己以前为什么会各方面都不顺，皆因不孝。以前做了很多伤害父母的事情，知道这个原因就要改掉自己错误的思想观念。”在实践上，孔子学堂的学员往往带动家人共同学习。该孔子学堂总务介绍，来孔子学堂的常常是“一个人带来一个家庭，带来一个家族”，共同参加文化教育活动，甚至发挥各自特长为师生服务，如学员的理发师家属免费为大家理发等。这种家人支持、常来看望且时常共同学习的模式与佛教的“出家”行为大相径庭。

生态一体，教养相资。该孔子学堂不仅是教育教学场所，也是有机农业生产场所，提倡素食文化。学员们在书本学习之余也要参与劳动，吃自己种植的有机食品，身心双方都受到了教育。在孔子学堂，读经教育与生活实践相辅相成，体现了儒教系统的经世性与儒教实践的整体性。

四 当代儒教实践的特点——以该孔子学堂为例

从儒教实践形态来看，孔子学堂是民间自发的组织，与官学有本质区别。该孔子学堂民间自办、三教合一、教养相资等特点更类似于传统书院。

与传统书院对比，该孔子学堂在儒家文化践行上存在专业性不足的表现。一方面缺乏专业性、学术性较强的高质量藏书；另一方面从创始人到管理层以及各位师生绝大多数是佛教信徒，并且教育内容多为佛教典籍，缺乏以四书五经为基础的系统儒学教育。在学习方式上，该孔子学堂的创新性不足，经典研究以读经和“复讲”为主，缺乏各抒己见的解读模式和质疑问难的反思精神，与古代书院学派林立、自执一言、百家争鸣的局面相去甚远。此外，相对于古代知识人的文化活动空间而言，孔子学堂的生活参与度较高，家庭伦理观念影响更深，比起深林隐居式的书院更加具有“入世性”。

通过田野调查可见，该孔子学堂作为当代儒教实践空间，在教育理念、

教育方式和教育市场等方面体现出如下特点。

1 核心理念借助佛教，自身理论自洽性差

该孔子学堂虽然以“孔子”命名并作为机构象征，也使用了《孝经》等儒家经典作为教育内容，但本质上是以佛教净土信仰为核心，创办人及其工作人员多为佛教徒。该孔子学堂创始人认为：“儒家有委屈，而佛家可以化解委屈。没有佛家，儒家很难在未来恢复好。所以要了解因果，做好人，追求幸福人生”。因此，佛教思想特别是因果报应论，是该孔子学堂的核心教育理念。

以孔子学堂为代表的民间儒教是一个再造的过程。儒教的礼教性是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底色，并且有丰富的经典文本可以直接拿来使用。“儒佛融通”或者“三教合一”可以从教理上相互补充，增强对抗终极问题的力量，既为儒教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又为佛教修行披上了贴近生活的外衣。该孔子学堂创始人也在采访中介绍道：“为什么说社会大众需要因果律，学过一年因果他的动力都是善的，才会把儒家的教诲落实好。轮回和因果才能够救这个社会，否则到时候都是个问题。”因此，《弟子规》等规戒性较强的文本结合佛教的因果轮回思想，便形成了一套制度化理论，用以灌输学员在道德教育上的缺口，实现“教化”的作用。

在中国的现有环境下，“宗教”往往是一个敏感词汇，开展宗教活动也受到相关部门的严格管理与限制。而优秀传统文化是被肯定的积极力量，孔子的形象又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在当今备受尊敬，因此借用“传统文化”指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佛教思想，是一个更稳妥的选择。于是便出现了以孔子之名讲授佛教因果报应等思想的局面。

2 对儒教的认知偏差

在该孔子学堂的讲学活动中，主要是佛教经典的解读与研习，而与儒家思想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弟子规》和《孝经》的文本讲解，其中又以《弟子规》为主。虽然该学堂的创办人声称未来要在“三年班”的开展中专注于四

书研读，但从目前的办学情况来看，作为儒家主要经典的四书五经却并未如因果报应等佛教思想一般渗入到教育和实践中。

《弟子规》是清代李毓秀所作的三言韵文，用以规范初入学堂的学童生活，是对孔子“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³⁶所反映出的孝悌仁爱思想的展开，意在说明洒扫应对与孝悌仁爱是儒学的基础，具备了较好的道德素养之余，若有余力则可以学习书本文化。然而，荻生徂徠则对“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解释为：孔子意在说明的是，即使具备了孝悌，如果不学文，则难免还是“乡人”。这也是学者应当注意之处。³⁷因此，孝悌仁爱虽是儒学的基础，只具备孝悌仁爱与“行有余力”者之间的区别则是乡人与儒者之别。同样，如果小人儒和君子儒分别象征着儒教的宗教性和礼教性，那么“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所描述的修养次第则产生了不同价值权重的背景，“乡人”甚至有沦为“乡愿”的风险。

加地伸行认为，儒教做学问的目标是博学，学以成圣。为了做诗文，要好好学古典语句并大量记忆。即重视背诵。这样的结果是博学。并且，理解并祖述作为古典的圣人语言是非常重要的，表现个性、创作新奇，则是邪道。这就是所谓“述（圣人之言）而不作（新奇之事）”³⁸。该孔子学堂强调的读经背诵集中于因果报应论等佛教思想，并未注重理解儒家圣人之言。并且，将视频讲座稿照搬复讲，也不易于培养博学善文的能力。这种道德教育在儒佛之间的错位，反映了孔子学堂实践过程中对于儒教思想核心的认知偏差，或为对儒教思想体系缺乏信心，或为强行以儒成佛，是儒佛并存之间难免的差榫。

36 《论语·学而第一》。见【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一，中华书局，2001年11月，第49页。

37 子安宣邦：《徂徠学讲义——〈弁名〉を読む》，岩波书店，2008年7月，第142页。

38 加地伸行：《儒教とは何か》，中央公論新社，2005年，第236页。

3 集中在下层，难以被高知者接受

通过学员情况了解可知，该孔子学堂的学员招募并非广纳贤才，而是针对怀有各式各样人生问题甚至“误入歧途”的“慕道者”，瞄准其道德教育的缺口，灌输以因果报应论为主的教化内容。

从该孔子学堂在戒毒所、监狱等处开展的针对性传统文化讲座也可以看出，民间的儒教实践带有较强的“救赎”性质，是儒家思想的自生式“下沉”，在下层市场更受欢迎、更有效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³⁹道德教育的缺位有时不得不以极端的方式弥补基础，但一味的灌输式“教化”以获取强烈的情绪与眼泪的输出不总是必要的。程颐也对这种“教化”理念细琢补充为“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顺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⁴⁰即使是以传统文化为内容的道德教育也需要在逻辑架构上精益求精，明理化、体系化，避免说教与威慑的空洞无物。

对于儒学等传统文化的学习，仅以高校相关人文专业的读书方式来举例对比。学术研究中对经典的解析往往参考多个版本，逐字逐句解读内容及多家注解，在诠释整段文本的基础上提出疑问和自己的见解，通过交流反思读取的内容，从而批判性地评价该文本。因此，这种灌输式、照搬式、自言式的经典教育缺乏反思、批判、创新的精神，面对道德需求较强的失足者可以大行醞酏灌顶，若严谨推敲背后的学理逻辑则很容易在质问前自乱阵脚。

五 结语

儒教是实践的学问，是生动的教化过程。在当代，儒家思想作为参与新时代社会建设的积极力量，邂逅了民间对于传统文化的需求，儒教也在解体

39 《论语·泰伯第八》。见【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四，中华书局，2001年11月，第105页。

40 见李敖主编：《周子通书 张载集 二程集》，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第二十五畅潜道录·伊川先生语十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11月，第433页。

之后面临着教育重构的时代任务。然而，复兴不是复古，更不是复原。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儒学复兴需要相应的空间、制度、模式等有效配合，这既不是空洞的口号，也不是教条式地照搬一切古代文化。儒教的批判继承应建立在对儒教系统内在结构的充分理解之上，认真践行儒家精神内涵。一味地打着儒家的旗号、滥用孔子的形象以今揆古，搭台唱戏，实质上背离儒家思想的“觚不觚”，只会在短期利好之后留下更久的对于传统认知的迷茫，况且先入为主的错位也会造成潜在的全面坍塌。

孔子学堂的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属于民间的草根“儒教”实践，与依托高校学术资源，特别是知名教授、“国学大师”等专业人才开办的“国学班”等“儒教”实践组织在办学资源上有很大区别。例如，位于北京市的什刹海书院坐拥首都优质的教育、文化、历史资源，依靠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学术资源，聘请知名教授、学术专家、国学“大师”讲学，并依托佛教名刹广化寺的影响力和区域辐射力开展传统文化方面的专题研究、高端论坛、学者讲座、经典教学以及其它传统文化活动。类似于什刹海书院等具有高质量文化资源的“国学班”更加专业，更加“高端”，具有浓厚的学术氛围和高校师生吸引力。再如，立足北京重点中学的孔阳国学工作室，以清华、北大、北师大毕业生及留学欧美等地后归国的高知人才为主要团队，为重点中学设立国学社和国学选修课、在高校建立儒学社团、成人网络课堂，开展国学必修课、选修课、社团活动、公开讲座，是一种利用顶尖高校本硕博毕业生人才开展中学和高校儒学教育为主的儒教实践。然而，这种高质量的“研究型”儒教实践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在人文气息浓厚、文化资源丰富的大城市之外，中国绝大多数的中小城市甚至乡镇、乡村难以受到这种资源的辐射。以本研究的孔子学堂为例，位于县级市、村镇的儒教组织倡导者、组建者、实践者、支持者都缺乏这样高质量、高专业度的教育文化资源，而是依靠民间无儒学学术背景的佛教信仰者“发心”所产生的推广传统文化的意愿，依托讲座视频的光盘、讲座稿印刷品来复述一些对《弟子规》等文本的解释，通过重复、背诵、“复讲”等灌输的方式完成“儒教”实践。因此，民间的儒教实践具有较强的资源限制。这种资源限制不仅会造成难以

专业地、学术地、思辨地解读经典，还会形成以民间儒教组织的创办人及管理层为中心的垄断与专断，造成学员们惟命是从，缺少反思的精神。这种以“规戒”实现“教化”理想的实践模式，显然违背了“学而不思则罔”“听其言而观其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等儒家对于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的要求。

民间“儒教”的实践更易于被百姓接受。中国目前的乡镇文化更接近于亲缘文化，而该孔子学堂正是瞄准了家庭伦理的市场，在“儒教”实践中开展与“孝”相关的经典讲解、感恩长辈教育、祭祖仪式等活动，并且在学员构成上具有明显的“个人带动家人”的家庭成员共同参与模式。“因果报应”、孝道传统、《弟子规》等文本中对日常行为的规范也对家庭生活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培养和睦家庭”的办学理念很好描述了该孔子学堂以家庭伦理为实践重点的特点。不过，这种“道德教育”主要以佛教经典与思想为载体展开，通过学堂讲学、教导等自上而下的方式展开，更接近于传统家庭观念以礼节的规训和规戒的形式“教化”参与者，并不完全是儒家思想的实践。同时，这种规训式的“教化”模式也应当警惕民间礼俗、落后的伦理道德甚至是“陋习”传播的反智影响。

“孔子，圣之时者也。”⁴¹孔子作为儒家圣贤，其哲学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有熠熠生辉的精彩成分，儒教的丰富历史遗产在当代亦必有可取之处。本案例的孔子学堂以自己理解的教育模式勾勒出一个当代儒教的实施范式，可以看作当代儒教对儒教空间以及对书院传统的继承发挥。在道德教育上借助了佛教思想，并在教学模式上以读经复述为主，都反映出了当代儒教实践的摸索阶段中对三教合一、述而不作等不同历史传统的传承。

此外，当代的儒教复兴不能忽视儒教的“祭教一致”特性。儒教不仅是学问教育，也不完全是道德教化，也是宗教之“教”。圣贤祭祀的神圣性在儒教空间中处于根基位置，儒教的宗教性承载着对于知识和学问的尊重，以及对于学以成圣的理想。“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

41 《孟子·万章下》。见【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十，中华书局，2001年11月，第315页。

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⁴²祭祀自发于对儒教的充分理解，“庙学合一”的背后是对儒教宗教性和教育性的有机融合，通过祭祀孔子确立对儒学的认同，并以儒学践行学问信仰。当代儒教空间的实践也应重拾祭祀的内涵，找回儒教精神的真谛。要认清“传统文化”，本质上要认清儒家“教化”的功能，好学重知，培养对于学问的敬畏感，在儒家信仰的基础上展开对于“入世”规范方面的训诫。

儒教之“教”不仅是教化之“教”，也是教养之“教”。规戒是儒教的起点。孔子学堂等民间儒教空间模式践行了儒家对于“修身”和“齐家”的要求，如何“治国平天下”，则应当扬弃僵化的教条，发挥儒教本有的教化、教养的功能，继承儒教对人性的重视，发挥人本作用，在新的时代耕耘儒家的优秀品格。儒教是实践者，是“行动派”，每个人都应亲自参与“教”的动态过程，完成自我教育、自我救助、自我完善的毕生功课。

42 《礼记·祭统》。见【清】孙希旦撰：《礼记集解》第二十五卷，中华书局，2019年2月，第1236页。